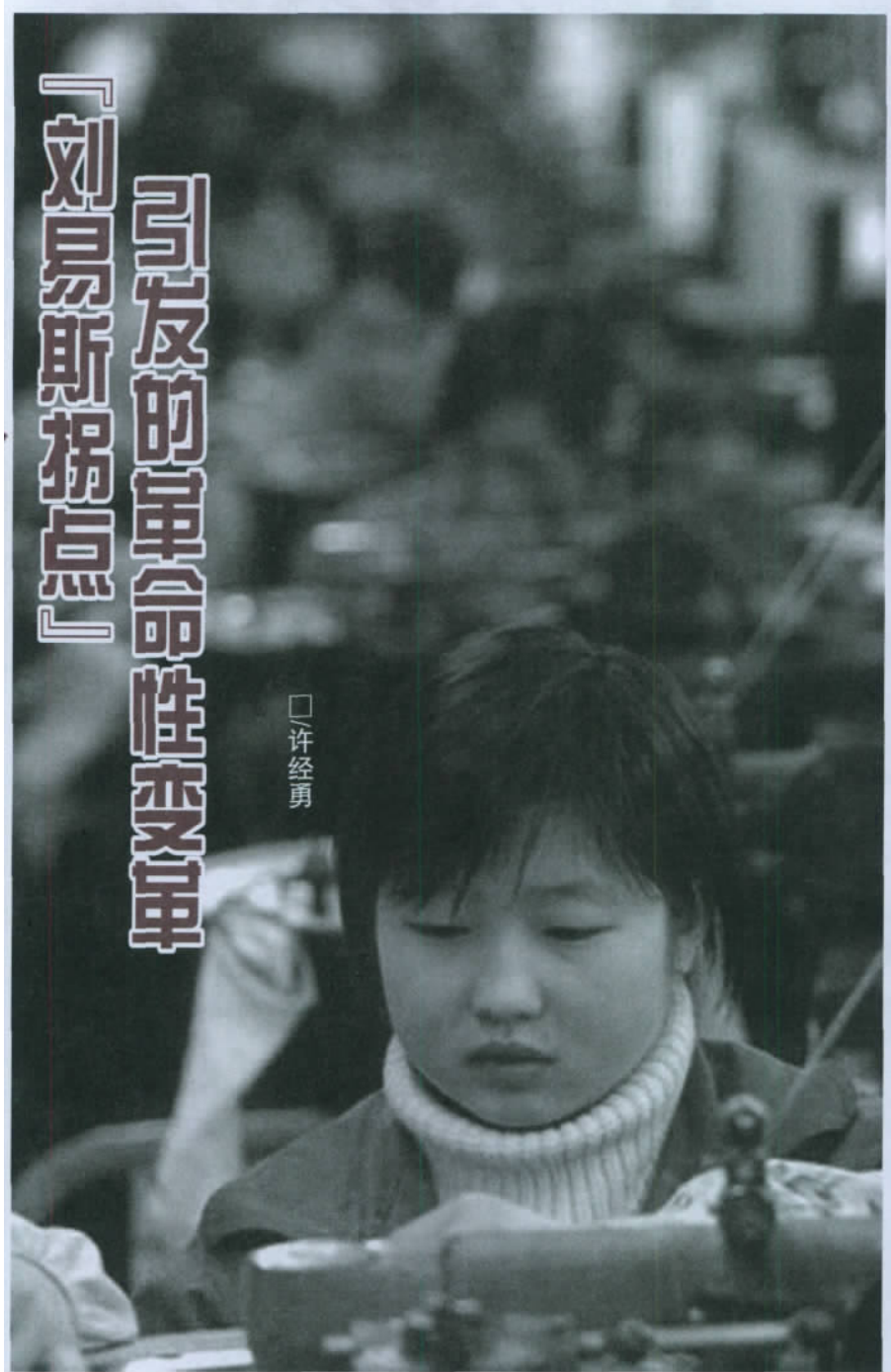


『刘易斯拐点』引发的革命性变革

□ 许经勇



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即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伴随而来的是“刘易斯拐点”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既是挑战,又是契机,它将

会驱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即形成越来越强化的“倒逼机制。”而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其如何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生哪

些深刻的变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的形成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其实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会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无限劳动力供给。而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

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向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是人追逐工作,即使不涨工资,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是工作追逐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员工。“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刘易斯拐点”的显现,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前兆。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目前我国已有2.4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农民带来增加收入的效果,但是,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还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即从1986年的1.7倍扩大到2010年的3.3倍)。客观地说,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即随着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力比较效益的均衡,并没有被我国的实践所证明。这就涉及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质的差别。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

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模式,又可以选择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常规发展,还在于实行高积累的财政政策,和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价格(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

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市民与农民工的划分,是客观上存在的城乡制度性差别在城市的复制。农民工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农民工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制度基础。由于城乡分割的制度性差别,农民工即使与市民何出等质等量的劳动,其报酬和福利差别仍然相当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相对于农村和农业,城市和工业是经济增长极,能够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顺理成章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我们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复杂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三、“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

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幼儿到80、90年代,就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

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辅以低抚养率就会带来高储蓄率,并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迅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2007年的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逐渐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



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一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就业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扩大到160万人,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程度(包括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体。但占绝大比重的低附加值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政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已经强调了1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还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核心环节,人为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即使不转变,照样有可观利润可赚,何必为改变现状付出代价呢?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继续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的终结,意味着无权用手投票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这就迫使政府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的消失,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契机,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地应对它。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